

doi:10.20270/j.cnki.1674-117X.2025.4005

政治经济学视域下新时代基本经济制度的 历史生成、价值意蕴与理论贡献

孟书敏, 杨方圆, 郭天瑶

(西安交通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 陕西 西安 710049)

摘要: 新时代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经验的科学总结, 是以人民为中心的价值立场下的重大制度性突破和理论创新。它实现了公有制和非公有制、生产和分配、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内在统一, 体现了共同富裕、共建共治共享以及人的全面发展的中国式现代化价值意蕴。发展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 要求我们坚持并深化对基本经济制度学理内核的科学认识, 深入阐释其中蕴含的人民立场、民生主线以及理论联系实际的科学方法, 充分揭示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中体现的理论逻辑、历史逻辑与实践逻辑的高度统一, 不断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理论与实践良性互动。

关键词: 新时代基本经济制度; 人民立场; 民生主线

中图分类号: F120.2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1674-117X(2025)04-0030-08

Historical Formation, Value Implication and Theoretical Contribution of the Basic Economic System in the New Era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Political Economy

MENG Shumin, YANG Fangyuan, GUO Tianyao

(School of Marxism, Xi'an Jiaotong University, Xi'an 710049, China)

Abstract: The basic socialist economic system in the new era constitutes a scientific synthesis of the practical experience in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representing groundbreaking anchored in the people-centered paradigm. It realizes the internal unity of public and non-public ownership, production and distribution mechanisms, socialist principles and market economy dynamics. The system embodies the axiological dimensions of Chinese modernization, including common prosperity, participatory governance, and holistic human development. The development of socialist political economy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in the new era requires us to adhere to and deepen our scientific understanding of the theoretical connotations of the basic economic system, deeply interpret the people-centric orientation, livelihood-focused praxis, and the scientific method of integrating theory with practice, fully revealing the high degree of unity between the theoretical logic, historical logic, and practical logic based on the Marxist position, viewpoint, and method, to continuously promote the positive interaction between the theory of socialist economy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and

收稿日期: 2025-02-16

基金项目: 陕西省社会科学基金项目“复杂系统视角下新质生产力的内涵特征与形成路径研究”(2024A004)

作者简介: 孟书敏, 女, 西安交通大学副教授, 硕士生导师, 研究方向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理论与实践。

economic practice.

Keywords: basic economic system in the new era; people's standpoint; livelihood-oriented main thread

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重要体现,是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制度保障。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强调,要“毫不动摇巩固和发展公有制经济,毫不动摇鼓励、支持、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保证各种所有制经济依法平等使用生产要素、公平参与市场竞争、同等受到法律保护,促进各种所有制经济优势互补、共同发展”^[1]。在其后的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专题研讨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再度强调要坚持和落实“两个毫不动摇”“为中国式现代化提供强大动力和制度保障”^[2]。一系列重要论述充分表明基本经济制度的建设对于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具有重要意义。基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分析框架,阐释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的实践意蕴和价值内核,解析以中国式现代化推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经济制度根基,不仅有助于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理论体系,而且能为其创新发展提供参考。

一、新时代基本经济制度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经验的科学总结

基本经济制度是一国生产关系与生产力相契合在经济领域的规定和体现。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把分配制度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上升为基本经济制度,建构起包括所有制、分配制和经济体制在内的多层次、多领域的新时代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下文简称“新概括”),开辟了认识经济建设规律的新境界,实现了重大制度性创新与突破。从思想史视角看,这一重要新概括实践并发展了马克思、恩格斯关于未来社会基本经济制度的设想,凝聚了中国式现代化实践对基本经济制度的认识过程和认识成果。

(一) 实现了公有制和非公有制的内在统一

所有制是社会经济发展的核心问题,是生产关系的重要内容。按照经典作家对未来社会的描述,社会主义建基于充分发展的资本主义社会生产力,“私有财产都会消失”^[3],代之以“集体的、以生

产资料公有为基础的社会”^{[4]363}。从这些论述可以看出,经典作家从理论层面认为公有制是比私有制更高级的所有制形式,是对私有制的扬弃,是“代替”而非“共存”关系。不过在后来的社会主义实践中,马克思也注意到,公有制代替私有制需要一定的前提条件,即“新的更高的生产关系”,需要它赖以存在的物质条件在旧社会的胎胞里发育成熟——生产力同旧的所有制关系不再相适应,其才可能出现。因此,“两个决不会”阐明了生产力极大发展是必须经历的自然史过程,是“既不能跳过也不能用法令取消自然的发展阶段”^[5]。显而易见,如何认识公有制和私有制的关系,是经典作家从一开始就给予关注的重大问题,对这一问题的认识在理论和实践中存在一定张力。

换句话说,实践中的社会主义与科学推断和理论建构下的社会主义在产生前提上发生了重大变化,如何实现“社会占有全部生产资料”依赖于社会主义的发展程度以及不同国家的具体实践过程。对于中国这样一个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大国来说,在全社会范围内使用生产资料不是一蹴而就的。尤其是新中国成立初期,国家积贫积弱,没有经历资本主义的充分发展,无法直接继承历史积累的物质技术条件。理论上讲,我国建立的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固然代表着“真正先进的生产关系”,但受制于当时低水平的生产力,缺乏消灭私有制的现实条件。这种状况恰如恩格斯所指出的社会生产力发展到一定水平但又没有达到高度发展的阶段、社会产品出现一定剩余但又无法充分满足全体社会成员的需要,“还没有发展到私有制成为这些生产力发展的桎梏和障碍”^[6]。

处于此初级阶段的社会主义,非公有制经济还拥有强大的生命力,并对经济社会发展有促进作用。支持和鼓励非公有制经济,对于解决生产力不够发达导致的一系列问题,进而巩固和发展以社会主义公有制为核心的生产关系具有重要意义。为此,党的十五大突破了单一公有制限制,明确提出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党的十六大以“两

个毫不动摇”为原则丰富了基本经济制度的内涵。此后,党的数次大会又肯定了不同所有制形式的法律地位和市场地位,使公有制的主体地位不断巩固和发展、非公有制的地位和作用得以提升。新概括进一步以规范表达体现了对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坚持发展与重大突破,实现了公有制和非公有制的内在统一。

(二) 实现了生产与分配的内在统一

收入分配是经济制度的重要内容,是“历史地规定的生产关系的表现”^[7]。新概括将分配制度纳入其中,既坚持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又适应市场经济的客观要求,实现了生产与分配的内在统一。这是因为在以往的理解中,生产关系首先表现为生产资料的占有关系,其次才表现为生产结果的分配关系,在这里,“分配”往往被看作动态的经济过程,是从属于“生产”的环节。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关于“生产和分配、交换、消费”的表述中,将“分配、交换、消费”一起作为“生产”的对立统一面,并认为尽管“消费”从“产品只是在消费中才成为现实的产品、消费创造出新的生产的需要”两个方面“生产着生产”,但从根本上看,马克思强调的是“生产生产着消费”,即“生产生产出消费的对象,消费的方式,消费的动力”,尤其是“分配的结构完全决定于生产的结构”。因此,马克思指出“消费资料的任何一种分配,都不过是生产条件本身分配的结果;而生产条件的分配,则表现生产方式本身的性质”^{[4]365}。例如,在私有制条件下,私有资本决定着分配,因而无法实现劳动者对“物”的真正占有进而建立属于“人”支配的社会。

由此可见,分配只是被看作经济活动中的一个环节,而非基本经济制度的组成部分。在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前,尽管我国在经济社会发展的不同阶段建立了与之适应的分配关系及有效的制度安排,也没有忽视分配制度的框架设计和体系建设,但基本经济制度仍然主要涵盖所有制层面。新概括则突出了分配制度与生产资料所有制的共轭关系,实际上强调了“分配并不仅仅是生产和交换的消极的产物”^{[4]527},对所有制关系的规定不能完全取代对分配关系的考察,这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

上述认识是在我国长期的经济实践中取得的。

新中国成立之初的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时期,实践中存在一定程度的平均主义分配倾向,但城市和乡村都对多种分配方式进行了探索,按劳分配制度逐步确立并不断完善。改革开放以后,收入分配制度逐渐上升为国家的制度安排。党的十三大首次阐述了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为补充的原则,坚持收入分配形式的多元化。党的十四大提出兼顾效率与公平、党的十五大明确了按劳分配和按生产要素分配相结合的原则,初步形成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制度架构。此后党的历次大会对分配问题不断拓展与深化,直到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将之上升为基本经济制度系统性建构的一部分,党的二十大进一步强调“分配制度是促进共同富裕的基础性制度”^[8],其内涵和实现机制也愈加明确。

(三) 实现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内在统一

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的关系是社会主义理论的重大课题。传统观点认为市场与资本主义等同、社会主义不能与市场相融合,而社会主义的实践表明,市场调节作为一种资源配置方式,其本身不表明社会制度的属性,社会主义并不排斥市场经济,相反两者可以有机融合。社会主义也强调社会财富的增加,而市场经济是增加社会财富的有效手段。因此,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被列为基本经济制度的内容之一,进一步确认了社会主义和市场经济的内在统一性。

这一创新内涵是在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探索与实践中形成的。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打破了市场经济与资本主义社会制度必然关联的固有认知,并尝试在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下扩大市场调节、强化市场机制,在坚持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的前提下建立商品关系和市场经济。党的十四大确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目标,扩展了对市场经济内涵和外延的认识,并把经济制度与经济运行体制相区分,推动实现社会主义公有制与市场经济的有效兼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总体框架初步形成。党的十五大至今,在不断探索政府与市场关系“新的科学定位”的过程中,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获得发展与完善,成为“生产资料所有制和分配制度得以‘落地’的重要制度条件”^[9],其不仅保证了生产资料的社会占有与个人占有基本一致,也弥补了传统计划经济体制缺乏激励、

创新不足等缺陷,避免了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无法克服的痼疾,解决了长期困扰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一个重大问题。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历经 40 余年的变革与完善,逐渐实现了市场在国家宏观调控下对资源配置的决定性作用,体现出社会主义公有制和市场配置资源的双重优势。也就是说,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自发性相比较,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的结合,不仅显示了所有制结构的制度特征与优势,而且能够体现分配制度的公平性与共享性,这也是改革开放以来经济发展呈现“中国奇迹”的重要密码。再从中国历代经济改革得失来看,商鞅变法、王莽改制、王安石变法乃至洋务运动,也都是在探索如何平衡“国家主义”和“民间资本”的关系,《盐铁论》讨论的核心同样是两者的关系问题。诚然,中国古代的“国家主义”和现代意义上的“社会主义”存在本质区别,但在强调宏观调控这一点上却有许多相似之处,这对于理解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所蕴含的“中国智慧”有一定启发。

二、新时代基本经济制度是中国式现代化价值意蕴的深刻表达

基本经济制度不仅是一个经济学问题,同时也是一种价值选择,与中国式现代化内在统一于“以人民为中心”的价值内核。中国式现代化要体现“以人民为中心”的价值选择,必须实现认知方面的重大突破。邓小平当年提出白猫黑猫论,强调“贫穷不是社会主义”“人民利益的标准是最高标准”,其中就蕴含着人民至上的价值逻辑。新时代背景下我们能够突破所有制的限制,将收入分配、经济体制一起纳入基本经济制度的范畴,进一步完善以人民为中心的社会生产关系,同样体现了中国式现代化的深刻意蕴。

(一) 共同富裕的价值目标

共同富裕和科学社会主义是贯穿马克思主义发展史的重大问题,蕴含着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基本原理。马克思曾指出,“无产阶级的运动是绝大多数人的,为绝大多数人谋利益的独立的运动”^[10],在未来社会“生产将以所有的人富裕为目的”^[11]。可见,经典作家是从“绝大多数人”“所有人”即人类整体的视角论述富裕问题的,目的

是消灭物质财富“被一部分人占有”的情况,进而实现“全社会所有”的“整个社会的共同的生产力”。之后,中国马克思主义者在实践中不断深化认识,邓小平强调“社会主义最大的优越性就是共同富裕,这是体现社会主义本质的一个东西”^[12],他还以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和消除两极分化为举措,强调“最终达到共同富裕”,这实际上是在本质论的基础上进一步强调目标论。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人民实现了“富起来”的历史性跨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习近平总书记担负起带领人民实现“强起来”的历史使命,他把共同富裕作为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重要内容和经济发展的出发点、落脚点,强调“使人民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更加充实、更有保障、更可持续”^[13],高度重视发展的充分性、平衡性、全面性和全体性。总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在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基础上,在实践中不断总结,在理论上寻求突破,将共同富裕理解为社会主义的本质规定、奋斗目标和根本原则,阐发出“全体富裕、同等富裕、全面富裕、逐步富裕、最终富裕”等多重含义。新概括从制度层面强调“共同”和“富裕”的有机统一,承载着“共同富裕”的价值目标,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一是在制度前提上,公有制性质摒弃了生产资料所有权的经济剥削,使之成为全体人民进行社会生产的公共生产资料,通过对具有全局性、关键性和系统性的行业领域实现公有制主导,从根本上遏制私有制导致的财富和收入过度集中,并通过宏观调控促使全体社会成员分享财富。

二是在重要保障上,所有权结构决定了按劳分配为主体的分配结构,这是保障劳动者主体地位及其权利的制度安排,主导着社会财富在社会成员中的合理分配,进一步限制了非公有制经济可能引致的贫富分化,并与多种分配方式一起,大大激发了个体的劳动积极性与参与热情。

三是从根本途径上,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实现了政府与市场关系的成功结合,在市场配置资源的基础上更好地发挥了政府作用,在积累社会财富的同时尽可能保障了全体人民的共同利益。因而,新概括既是共同富裕不懈追求的价值体现,也是实现共同富裕的制度保障。基于此,党的十九届

五中全会在2035年远景目标中首次提出“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取得更为明显的实质性进展”，要求“民生福祉达到新水平”^[14]；党的二十大强调“增进民生福祉，提高人民生活品质”^[8]，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再次强调“在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大任务”^[1]，一系列重要决策部署拥有了充分的制度依据。

（二）共建共治共享的价值体现

如果说共同富裕是以人民为中心价值理念的目标追求，那么共建共治共享则是这一价值理念的过程体现。在一般的理解上，“共建共治共享”主要体现了社会治理制度的要求。2020年8月24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主持经济社会领域专家座谈会时强调：“要完善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制度，实现政府治理同社会调节、居民自治良性互动，建设人人有责、人人尽责、人人享有的社会治理共同体。”^{[15]338}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再次强调，要继续健全这一治理体系。由是观之，从价值视角看，共建共治共享不仅是社会治理的核心要义，也是以人民为中心推动经济社会发展的必然选择。这是因为，要实现富裕的“共同”，必须在“建、治、享”三个方面体现“共同占有、共同参与、共同分享”。

这一价值追求也贯穿在新概括中。首先，共建共治共享要求做大社会财富总量的“蛋糕”。治国之道，必先富民。经济发展的根本目的是为全体人民提供量多质优、种类丰富的“蛋糕”。客观现实要求国有经济控制与国家安全和国民经济命脉相关的重要行业和关键领域，在重大民生问题上摆脱资本逻辑的支配，通过承担更多的经济、政治和社会责任，成为做大做强蛋糕的坚实基础。非公有制经济在促进创新与就业、稳定增长、改善民生等多个领域发挥显著作用，是满足人民多层次合理需要的重要组成部分。

其次，共建共治共享要求在社会成员间分好“蛋糕”，避免富人越富、穷人越穷、中等收入群体偏少的不合理现象。这必然要求构建公平公正的分配机制，否则就会失去经济社会发展的持续动力。具体来讲，当前意义上的公平公正分“蛋糕”需要突破传统分配领域，在既有生产要素（劳动、管理、技术、资本等）按贡献参与分配的基础上，将知识、土地、数据等要素纳入分配体系；

同时把对效率与公平关系的处理渗透进保障人民群众政治权利、经济利益、文化需求、社会福利以及环境期待中，形成共建共治共享的动态激励制度基础。

再次，共建共治共享还要求以人民为中心推动凝聚各界力量、形成广泛共识的社会治理新格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将市场机制、微观主体、宏观调控三者有机结合，在促进生产力发展的同时体现社会主义的制度属性，强调在平等的经济关系中形成和谐的利益关系，进而有效消除制约经济社会发展的各种不利因素，推动不同社会主体广泛参与社会建设、社会治理，共同分享社会发展的成果，成为新时代共建共治共享治理格局的价值载体和建构途径。

（三）人的全面发展的价值旨归

人的全面发展是马克思主义的最高价值诉求，是人真正“占有自己的全面的本质”^[16]。马克思始终把处于特定生产关系中的现实的人作为经济社会的主体，把人的自由全面发展作为其理论研究和革命实践的价值旨归，坚持“人”在推翻旧世界和建立新世界中的决定性和主体性作用。恩格斯在《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中对人的自由全面发展进行了描述：“通过社会化生产，不仅可能保证一切社会成员有富足的和一天比一天充裕的物质生活，而且还可能保证他们的体力和智力获得充分的自由的发展和运用。”^{[14]670}不难发现，马克思主义致力于探究“现实的人的解放”的经济制度和生产关系，主张在经济实践中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

但人的解放是一个历史范畴，依据历史唯物主义，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前提是实现物质财富的极大富足，从而为向完全的社会主义过渡创造物质条件。而在这一过程中，人的发展与物质财富的增长通常是顾此失彼的，一般表现为对物质利益的执着追求造成身处其中的人的片面或者畸形发展，甚至造成对自身或者他人的压制、扭曲或践踏，从而导致异化。因此，实现物质财富增长和人的全面发展的内在统一，需要建构社会主义价值旨归引导下的现实基础。

毋庸置疑，新概括承载着人的全面发展的制度安排，它一方面肯定了社会主义目的性和市场经济手段性的完美结合，印证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体制是“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发展市场经济”^{[17]64}, 有助于夯实人的全面发展的现实物质基础; 另一方面,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与生产资料所有制及分配制度, 共同构成了物质财富增长和人的全面发展相统一的制度基础, 为人的全面发展提供了切实可能。例如, 一直以来我国把住房、教育、医疗等作为个人生存和发展条件的公共产品来提供, 为每一个人提供基本的生活保障、平等的发展基点和公平的发展机会, 不断形成促进人的全面发展的必要基础和合理机制。

再者, 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运行机制来看, 市场调节与宏观调控相结合, 要求“两只手同时发挥作用”, 这实际上超越了西方经济自由主义和国家干预主义把市场和政府视为对立的两面继而面临二难选择的境况, 目的是在准确认识并科学把握商品经济基本规律的基础上, 努力消除市场运行的自发性弊端, 在更深程度上合理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在社会主义现代化远景目标中将“人的全面发展”取得更为明显的实质性进展作为重要内容, 强调坚持和完善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 推动“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更好结合, 再次强调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和要求, 进一步拓展了个人和经济社会的发展空间。

三、新时代基本经济制度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理论升华

有学者言, 新时代基本经济制度“不只是对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理论创新, 也是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探索的理论升华”^[18]。这是因为它鲜明体现了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 有利于透彻解析中国经济建设的理论依据、发展轨迹、历史经验和基本规律, 为发展中国特色政治经济学提供研究方向和学术支撑。

(一) 在科学阐释中明确人民立场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社会主义“发展为了人民, 这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根本立场”^[19]。因此, 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 不仅需要经济学的逻辑抽象力, 明确研究对象、理论起点和体系结构, 更要“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重大原则”^[20], 从“为谁立说”的角度站稳价值立场, 着眼于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

使之与资本主义经济学在理论阐释上有根本区别。即是说,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不仅要研究“生产力-生产关系”基础上的“现代社会经济运动规律”, 更是一门研究“富国裕民”的学问, 必然要“以人民为中心”从根本上确定理论立场, 以“现实的人”为出发点和归宿点——这与资本主义经济学“原子人”“市侩人”“手段人”“理性人”假设有本质区别^[21]。这样一来,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必然将“人民”“幸福”“美好生活”等范畴纳入研究体系, 从人民“期盼有更好的教育、更稳定的工作、更满意的收入、更可靠的社会保障、更高水平的医疗卫生服务、更舒适的居住条件、更优美的环境”^{[17]19}等方面着手, 实现对马克思关于“人的全面发展”的中国阐释。

在解释具体范畴时,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必然呈现明确的人民指向, 如阐释“财富”概念时, 不仅要分析财富的量的积累, 还要分析“为谁创造财富、由谁创造财富、如何分配财富”等问题, 要研究如何对资本进行有效驾驭, 实现社会主义公平正义, 体现共建共治共享的价值要求, 从而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能够为解释利他行为、阐明公共目标、理解经济社会发展提供理论支持。这一点在科学阐释我国经济发展规律时更为明显: 中国特色政治经济学基本规律不仅包括生产分配领域的经济规律, 还包括党领导经济社会发展的体制机制、国家顶层设计的政治规律等。不难发现,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在逻辑起点、研究对象、范畴界定、构建原则、研究宗旨等各方面坚持了马克思主义的人民立场。

(二) 在历史印证中厘清民生主线

恩格斯曾指出: “政治经济学本质上是一门历史的科学。”^[22] 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要反对脱离我国具体历史阶段进行历史虚无主义的研究^[23]。毛泽东也指出, 中国的政治经济学要从历史分析开始, 不能像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那样——像一本政治经济学辞典。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 不仅要坚持马克思主义理论立场, 还要从社会主义发展史、中国经济建设史角度, 寻找贯穿于经济发展各个环节和过程的理论主线, 为理论提供历史解释力。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 “只有聆听时代的声音, 回应时代的呼唤, 认真研究解决重大而紧迫的问

题,才能真正把握住历史脉络、找到发展规律,推动理论创新。”^[24]因此,中国特色政治经济学理论创新,要深入我国革命、建设、改革三大历史阶段去探究理论演进的基本脉络,科学分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发展的典型事实及其内在逻辑。通过梳理新中国70余年发展历程可以发现,只要中国特色经济建设深入人民群众,关注民生、倾听民意、体察民情,就能从中国国情出发,破除思维障碍,推动经济社会发展。显然,新时代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植根于社会主义事业探索借鉴、初步建立、创新完善、成熟定型的历史进程,成为基于民生需求引领实践与时俱进的自然结果。

历史地看,在最初的社会主义探索中,毛泽东根据中国国情,认识到不能完全照搬苏联理论,《论十大关系》事实上开始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建构,《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中提出现代农业和现代科学文化的目标,为阐释社会主义经济规律提供了很好的素材。改革开放之初,邓小平站在“以人民为中心”的高度,敢于突破“姓资姓社”的认知,作出“贫穷不是社会主义”“社会主义的本质是发展生产力”等重要论断。针对在尖锐斗争背景下开启的小岗村改革,邓小平于1980年5月31日同中央负责人就农村问题发表了重要讲话,随后中央召开各省市自治区第一书记座谈会并印发“75号文件”,从此引起了中国发展和命运的大变革。进入新时代,习近平总书记从人民群众“不仅对物质文化生活提出了更高要求,而且在民主、法治、公平、正义、安全、环境等方面的要求日益增长”^[25]的角度,科学认识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按照马克思主义的观点,人的需要分为生存、享受、发展三个层次,习近平提出的美好生活需要就是享受型向发展型的转变梯度。这一思想是对马克思主义人民生活思想的坚持与创新,进一步印证了扎根于新中国70余年历史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民生主线。

(三)在现实探索中坚持科学方法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理论联系实际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方法论要求。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把实践经验上升为系统化的经济学说”^{[17]328},并将之视为建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政治经济学理论框架面临的一个重要问题。

理论联系实际不仅强调要将成功实践提升为系统理论,而且要求用新理论解释实践中出现的新问题。一直以来,个别学者采用西方经济学范式的通用数学模型研究中国经济问题,“这种研究实际上还是西方经济学的框架”,不能看作是中国特色经济学,“只是西方经济学的中国案例应用”^[26],在一定程度上凸显了以科学的方法开拓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迫切性。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表明:不论是提炼实践经验,还是研究实践问题,如果始终坚持实事求是、理论联系实际,就较容易得到正确的答案和解决问题的思路。在持续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习近平总书记反复强调“民生就是经济”,这一重要论断充分说明了只有立足中国实际最大限度地保障和改善民生,才能激发深层需求,有效刺激消费,从而推动经济发展。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将“新发展格局”作为“十四五”规划的核心问题,创造性地以经济大循环为主线论述社会主义经济发展,应当说,双循环的关键在于内循环。那么如何做好内循环呢?广大的农民人口和农村土地在新型城镇化进程中蕴含着巨大的需求空间。因此,习近平总书记特别强调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中“坚持扩大内需这个战略基点”^{[15]115},不但要求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实现产业链现代化、供应链现代化,更要实现农业农村现代化。党的二十大进一步强调把“实施扩大内需战略同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有机结合”,把“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作为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和全社会共同富裕”^[8]的制度保障,生动展现了中共立足发展着的实际持续推动制度完善和理论创新,不断开创新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风貌。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秉承“人民至上”的价值导向,始终坚持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基础上的理论、历史和实践逻辑的高度统一,成为“以人民为中心、人民生活美好幸福、发展谋求幸福”的民生经济学,对新时代经济社会发展的人民之间、实践之间、历史之间作出中国解答。

参考文献:

- [1] 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 [N]. 人民日报, 2024-07-22(1).
- [2] 深入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精神 凝心聚力推动改革行稳致远 [N]. 人民日报, 2024-10-30(1).
- [3] 马克思, 恩格斯, 列宁, 等. 论共产主义社会 [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58: 261.
- [4] 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 第3卷 [M]. 3版.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12.
- [5] 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 第5卷 [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09: 10.
- [6] 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 第1卷 [M]. 3版.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12: 303.
- [7] 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 第7卷 [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09: 998.
- [8] 习近平. 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 在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 [N]. 人民日报, 2022-10-26(1).
- [9] 朱安东, 孙洁民. 作为基本经济制度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初探 [J]. 思想理论教育导刊, 2020(5): 101.
- [10] 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 第2卷 [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09: 42.
- [11] 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 第8卷 [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09: 200.
- [12] 邓小平. 邓小平文选: 第3卷 [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93: 364.
- [13] 习近平. 习近平著作选读: 第2卷 [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23: 37.
- [14] 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的建议 [N]. 人民日报, 2020-11-4(1).
- [15] 习近平.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 第4卷 [M]. 北京: 外文出版社, 2022.
- [16] 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 第1卷 [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09: 189.
- [17]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 习近平关于社会主义经济建设论述摘编 [M]. 北京: 中央文献出版社, 2017.
- [18] 顾海良. 基本经济制度新概括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新发展 [J]. 毛泽东邓小平理论研究, 2020(1): 1.
- [19] 习近平. 论把握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 [M]. 北京: 中央文献出版社, 2021: 61.
- [20]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在北京举行 [N]. 人民日报, 2015-12-22(1).
- [21] 常庆欣. 马克思“现实的人”的理论潜力研究: 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话语体系的尝试 [J]. 政治经济学评论, 2020, 11(2): 137-155.
- [22] 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 第9卷 [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09: 153.
- [23] 刘学梅, 郭冠清.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对象的探索 [J]. 经济学家, 2019(12): 14-23.
- [24]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 习近平关于社会主义文化建设论述摘编 [M]. 北京: 中央文献出版社, 2017: 80.
- [25] 习近平.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 第3卷 [M]. 北京: 外文出版社, 2020: 9.
- [26] 洪银兴. 中国特色政治经济学的体系构建和研究重点 [J]. 政治经济学评论, 2019(6): 3-19.

责任编辑: 陈璐